

抗日战争

Anti-Japanese War ★ The Rise of the CCP

中共崛起

揭示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揭秘中共抗战中发展壮大之原因

卢毅 罗平汉 齐小林◎著



抗日战争

Anti-Japanese War  The Rise of the CCP

中共崛起

卢毅 罗平汉 齐小林◎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 / 卢毅, 罗平汉, 齐小林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60-8195-5

I. ①抗… II. ①卢… ②罗… ③齐… III. ①抗日战争—关系—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K265. 07 ②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6836 号

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

(KANGRI ZHANZHENG YU ZHONGGONG JUEQI)

作 者: 卢 毅 罗平汉 齐小林

责任编辑: 简以宁 杨 灿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5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195-5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前　言

1937 年至 1945 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这八年中，中共不但坚持了敌后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且真正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全面抗战爆发之时，陕北的主力红军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两军总人数五万余人，全国党员约 4 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 1 处，根据地人口一百余万。到抗战胜利之时，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达到 120 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亦达到 120 万人，根据地增加到 19 块，根据地人口达 1 个亿。

在抗战前的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近十年的战争，但双方力量的对比甚为悬殊，国强共弱的态势十分明显。经过八年抗战，中共从原来狭小的活动地域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尽管国民党军队的数量、统治区的面积人口仍大大超过中共，但中共的实力与影响力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真正成为可与国民党比肩的大党，中国的政治地图亦由此而改写。

抗战八年中共何以越抗越大，其中原因究竟在哪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这恐怕仍是许多人关注

的话题。这些年来，抗战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著述可谓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这些著述，或是抗日战争史的宏观述说，或是某些具体事件的微观探讨，而对于抗战八年中共何以壮大似乎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我们几位都在中央党校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于是草写了这部小册子，试图从不同侧面就此做点简单的探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走向舞台中央	001
一、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策略	002
二、国民党“剿共”与中央苏区的丧失	011
三、联手地方实力派	014
四、确立逼蒋抗日方针	023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035
第二章 以斗争求团结	056
一、拒绝蒋介石合并国共两党的建议	056
二、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069
三、皖南事变前后的政治交锋	084
四、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夭折	114
第三章 敌后游击战	122
一、作为战略选择的游击战	123
二、中共军事力量的扩张和停顿	132
三、打破封锁的努力	138
四、军事力量恢复和向正规战转变	148
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52
第四章 “大力发展党”	164
一、“十百倍的发展党员”	164

二、中共组织的大发展	171
三、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78
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184
五、各地中共组织的整顿	189
第五章 减轻人民负担	198
一、苏维埃革命失败的教训	198
二、抗日根据地主要经济政策	207
三、抗战前期中共的经费来源	224
四、精兵简政与大生产运动	235
第六章 “因为边区有民主”	248
一、“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248
二、“民主政治，选举第一”	254
三、推行“三三制”	265
四、延安成了民主的灯塔	276
第七章 举起自己的旗帜	283
一、“国民革命”之旗与大革命失败	283
二、“苏维埃革命”之旗不适合中国	295
三、高举新民主主义之旗	309
第八章 统一思想	330
一、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缘由	330
二、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展开	358
三、全党思想的空前统一	376

第一章 走向舞台中央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中国内部的政治规则就逐渐发生变化，所有的政党、派别都要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亡，都要考虑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还是一个内部纷争不已的政治体，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时，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团结。中华民族的这一转向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美国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柯博文指出：“只有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并通过盟国来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但这一创建的建筑师将是毛泽东，而非蒋介石。”^①的确，从后见之明的角度讲，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共力量迅猛恢复并急速发展的转折点。然而，回到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时的历史情境，恐怕连中共最高级的领导人也没有预想到能够在十二年后取得全国政权，蒋介石也不会认为自己会在十二年后退往台湾。事实上，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还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转变，都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碰撞、折冲和博弈的结果。

^① [美] 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

果，这里既包含着历史的偶然性，也包含着领导者的智慧和力量角逐的魅力。

一、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策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除了少部分军队自发的零星抗争，东北军在张学良的指挥下未做任何抵抗，东北在三个月被日军占领。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国共两党由分裂走向战争已经四年时间了。1923年到1927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进行过合作，发动了国民革命运动。虽然在此期间，国共两党的力量都得到了猛烈的扩张，国民革命运动也成绩斐然，但是，从本质上讲，“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都厌恶对方。国民党在振兴党、发展一支党的军队和进行国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且期望利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在这微妙的关系中，只要对双方有利，合作就会持续下去；而双方都希望在对方表现不济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① 孙中山在世时，凭借其巨大的威望，还能够维系国共之间的合作。孙中山去世后，分裂势力不受约束。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利进行，国共双方的裂痕也随之扩大，终于在1927年4月彻底分裂。

国共分裂之后，中共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将建立工

^①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页。

农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时，不仅中共革命的理论受到共产国际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中共革命也需要符合苏联的国际战略。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时期理论。会议认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这个第三时期，使生产力的发展同缩小了的市场之间的矛盾特别急剧的尖锐化了，因而必然引起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加剧了各种国际矛盾”，因此，“这时期必须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①。依据“第三时期”理论，在这新的时期，必然导致“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必然发展成为“直接革命的形势”。1929年7月3日至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十次全会，进一步发展了“第三时期”的理论，会议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提纲》认为，当前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增长，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涨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②。国际形势的演变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最后决战。

在资本主义总的崩溃即将到来，直接革命的形势即将形成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呢？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如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9—570页。

^②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4、145页。

果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取得胜利，那么这不仅意味着苏联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败”^①。“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② 资本主义总危机、战争和革命时期以及保卫苏联等口号的提出，深刻地影响了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行坚决的“进攻路线”；为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采取“阶级反对阶级”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资本主义国家坚决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保证上述路线和策略的执行，各国共产党内采取了坚决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不调和的党内斗争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表宣言，认为发生这一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③ “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④ 共产国际同样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了把东北变成反苏

^①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48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400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424页。

战争的基地，因而再次强调保卫所有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的口号。

那么怎样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并保卫苏联呢？中共临时中央认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和继续罢工、罢课和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地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的革命群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① 1931年年底，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条件”^②。因此，中共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要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本的前提，即只有推翻国民党才能够进行抗日。

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继续北伐。1928年12月29日，东北正式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西南、西北各省在此之前已经归附国民政府，至此全国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国民政府的统一虚有其表。它不仅面临着中共的武装反抗，很多地方军事人物与南京仍保持着实质性的财政和行政独立。只要这些地方军事人物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就尚可以合作；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些地方军事人物就将见机行事，甚至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深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430、431—434页。

^②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关于反帝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2月），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受内部派系倾轧的困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向北大营进攻。面对日军攻击，东北军未做抵抗即撤退。蒋介石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也没有派中央军增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除了日军在东北的挑衅，南京国民政府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威胁：在华北，蒋介石依靠张学良巩固他在中原大战中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胜利；在长江流域，中共的武装力量正在迅猛发展；在华南，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成立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蒋介石认为在东北的坚决抵抗极有可能毁灭他的政权，另外，他强烈地怀疑他的许多对手尽管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私下却在向东京寻求妥协和帮助。^①然而，不管怎样，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它需要担负的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责任，因此，人们普遍指责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借口保护日侨进攻上海，遭到驻扎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和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挑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逐渐明确起来。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告诫国民“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

^①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外。”^① 1932年3月14日，当国民政府和日本就淞沪事变进行停战谈判之时，蒋介石宣布：“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4月初蒋介石在南昌督师剿共，宣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5月初又指出：“就客观的情形与主观的战略来看，今日救国的途径，只有照着古人‘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来力行：我们必须先把后方与内部安定起来，然后攘外才有办法，才不致处于内外夹击的危急。”^② 1932年6月，蒋介石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攘外一定要先安内”。^③ “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对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评价一直以来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安内”不过是对日妥协的借口而已，当然，也有人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版图当中，国共两党相互对立，处在两端。在国共两党之间，是游移于南京国民政府当权阶级、阶层与工农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势力，主要由爱国民主人士、中间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组成，被称为中间势力。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中国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① 《蒋“总统”言论汇编》第21卷，（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4页。

^②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对日抗战时期》初编（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4—37页。

^③ 《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685页。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在国内不仅有着国共之间的纷争，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由政见不同导致的军事对抗，这阻碍着中国集中力量应对日本人的侵略。很多中间派人士，尤其是中间派的知识分子痛心于频繁的内争导致国力衰败，迫切希望各党派能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北京大学师生通电指出：“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①9月26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朱庆澜呼吁团结御侮的通电，称“时至今日有何恩怨不可冰释？有何政见不可牺牲？”应“举国团结，一体兴奋，同舟风雨，共济艰危”。^②10月23日，著名民主人士马相伯在《申报》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呼吁国人“定息内争，共御外辱”：

际此天灾人祸外忧内患迭乘，国人应晓然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即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试静思之，湖北伐湖南，广西征广东；本是同根相煎迫，宁有得失之可言！而二十年内战循环，如出一辙……今后国民，各抱决心，痛改前非，自赎自救，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则十年生聚教养，终有自强振作之一日。^③

为造成举国抗日的局面，中间势力吁请国民党内部停止派系战争：“国家之贫弱，军人之蛮横，乃至外患之压迫，莫不

^①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3页。

^② 转引自王学峰：《中间势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③ 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页。

在内战互为因果”，“苟再不团结一致，协力对外，则国破家亡，指日可待”，因此，国民党政府及各派系应“立息内争，一致对外”，“消弭内战，共御外辱”，“相忍于国，不要自相残杀”^①。为此他们组织了废止内战同盟，为停止内战积极活动。

中间势力深知，中共是中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没有国共合作就很难实现团结抗日的目标，因此，他们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军事剿共，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1932年1月21日，天津《大公报》撰文，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当兹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残吞并之时，为民族生计，为中山主义，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②。“与其持久内战，实力耗竭，对外失其抗拒之力，而一方面又断无屈服苟免之余地，何若激发共产党之良知良能，打破历史恩仇，尽捐党派情感，能抚则抚，力求团结一致，先其所急，共同自卫，打开血路，而后以整个的国家民族本身之悠久利益，谋政治经济之大改革。”《大公报》要求国民党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同时，也奉劝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推翻国民党的主张：

如再一味谬执成见，以军事行动，牵制政府兵力，使国家自卫陷于不能，则结局整个民族，终为日本蛮力压倒，姑无论理想的改革，愈成梦境，即令据有若干赤化地域，一旦全局沦陷，此区区者，又且可以苟存？且日本得势，国际忌妒，则竞争发泄之途，

^①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大会特刊》，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 1932 年版，第 8 页。

^② 《蒋汪入京》，《大公报》1932 年 1 月 21 日。

依然不出中国，边疆领土之分割，势力范围之复活，共管瓜分，势具难免，局面至此，民族且亡，更有于党派之得失利钝？^①

1933年3月17日，天津《益世报》社评就国共合作事宜向当局建议，“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政府，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胡适也认为，“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政敌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消灭的”，“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因此建议“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②甚至连一贯低调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这时也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③。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势力和派别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大体而言，“抵抗日军进攻，挽救民族危亡”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派别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是不一致的。不同的抗日策略在现实政治中的相互碰撞、发展和演变，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① 《进一步之废止内战运动》，《大公报》1932年7月21日。

^② 宋广波编著：《丁文江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页。

^③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